

蔬菜食品价格飞涨原因探寻



货币超发、游资冒泡、美元作乱，当这些因素掺合在一起的时候，物价想不涨都难

百乐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出口业务部副经理张俊芳说，“绿豆10月初每吨还不到1700美元，现在已经是每吨2100美元。”

记者调查发现，进出口商和普通消费者同样感受着农产品的这轮“涨价狂潮”。在不久前闭幕的第108届广交会上，来自中国各地的农业企业纷纷用“一天一个价”来形容当下农产品的价格波动，“涨价”也是本届广交会最热门的词汇。

“每天看到新价钱脖子都冒凉气。”经营粉条的山东金都塔林食品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曲学磊介绍，现在土豆淀粉已经从三个月前的6000多元一吨涨到近1.2万元一吨。

河北德惠贸易有限公司水果干果部经理郑辉说，原来是苹果涨，涨了20%，结果梨也开始跟风，也涨了近20%。

现在“是吃的都涨价”，还“一天一个价”，曲学磊说。

长单大单曾是外贸企业的“最爱”，现在他们却将其拒之门外。“我们现在报价不仅是短单，都快成了‘短命单’了，”曲学磊介绍，“我交易会上报的价格，交易会结束前作准，闭幕我就不认账了。没办法，价格波动太剧烈了。”

安徽安粮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胡茂昶对此也深有感触：“接得越大，就可能意味着亏得越多，现在公司一般都只接受半个月左右的订单，最长的绝不超过一个月，而且价格需要先说明可能会调整。”

东辰伟业食品有限公司进出口部经理董超告诉记者，现在报价成为了企业经营中的难题，“我们现在的报价一般都是3至5天，不超

过一个星期。现在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太剧烈，超过一个星期的订单就很难提供报价。”

农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正在带动加工食品价格上涨。记者在广交会上看到，受白糖价格大幅上涨的因素影响，巧克力、糖果等产品价格普遍上调了10%左右。由于笋的价格上涨，出口的笋罐头价格上涨了25%左右。

而更令企业感到忧虑的是，这种涨价风显然正在向主要农产品蔓延。北京美全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靳保全说，目前稻谷等农产品受长时间涨价效应影响，已经出现上涨的苗头。

游资四处冒泡

11月11日，官方数据呼应了市场上“涨声”一片的现状。当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继7月、8月和9月我国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连创新高之后，10月份CPI同比上涨4.4%，涨幅比9月份扩大0.8%，创下25个月来的新高。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分析指出，10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1%，环比上涨1.1%，其中蔬菜价格涨了31%。食品价格对10月CPI上涨的贡献为74%，可以说是CPI上涨的主要推手之一。

“这么多农产品一个接一个涨，而且涨得这么厉害。农产品又不是股票，正常市场情况下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此轮农产品上涨，董超觉得很奇怪，他怀疑游资在里面起了重要作用。

张俊芳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按照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一种产品短缺会适度带动同

类其他产品价格有所上涨，但像当前这种绿豆涨了红豆涨、红豆涨了芸豆也涨，“是个豆都涨，就没道理了，而且价格也不应该涨这么高。只有游资囤积居奇、故意哄抬，才会出现这种异常情况。”

曲学磊告诉记者，最明显的一个例证就是很多国内原本低于国际价格的农产品现在已经“咸鱼翻身”，远高于国际水平。以生姜为例，本来东南亚、印度都在中国采购，现在由于价格离奇上涨，这些采购商都跑去采购明显低廉的泰国生姜了。

“我敢说，这里面游资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包明华认为，每种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都有不同，比如，西南大旱导致糖减产，造成糖价飙升，但是，农产品价格这种普遍和集中上涨，与市场上流动性过多有很大关系。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用“按下葫芦浮起瓢”来形容此轮物价上涨，他分析，这是过多的货币投放到经济领域后炒作资金四处冒泡的表现；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也指出，货币发行过量是当前物价上涨的几大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自2008年应对危机以来，粗略估算我国银行体系已累计发放人民币贷款超过17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已接近70万亿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广义货币供应量最大的国家。市场普遍认为，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正在形成。

“总体上讲，由于市场上流动性过多导致过多的购买力需要寻找出路，但以投资首选的房地产目前处于调控阶段，股市处于恢复性阶段，人民币升值也限制了资金外流，因此资金大量集中在消费和投机上，再加上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及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目前农产品涨价的市场行情。”包明华分析道。

美元推波助澜

此外，输入型通胀，即全球流动性过剩也是此轮物价上涨不可忽略的因素。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综合研究室主任王海峰曾将今年和2007年的物价上涨做了对比。他认为，2007年CPI上涨主要源于国内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内部和局部的原因，而今年的通胀是内外因素交加，面对的背景是全球性的危机。“这次的难度、政策的反应都要比2007年复杂得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外贸研究部副主任李健说，由于发达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通胀压力加大，大宗商品价格持上涨，中国农产品自然也难以置身事外。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普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最近启动了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中金公司在最近一期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从外部环境看，这些政策将继续对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构成上行支撑，加大了国内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许小年认为，美联储超发货币，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对于像中国这种依赖海外资源市场的国家而言肯定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把钱吸引到实业领域

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压力给调控带来很大难度。实际上，在10月份CPI数据出台之前，政府已经开始了平抑物价，治理物价的调控。10月份的央行意外加息，11月10日宣布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都被市场看做是流动性收紧的信号。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这次全面提高存款类金融机构准备金率，说明央行判断社会整体货币流通量已经偏多，已经有必要通过全面提高准备金率来控制市场流动性总量的增长。

不过，由于流动性短期内难以快速收紧，而未来国际货币泛滥的趋势不减等等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依然存在，很多专家担心，即便央行已经采取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手段，通胀压力依然会长期存在。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担心，物价上涨将向非食品领域蔓延，通胀将向全面通胀方向演进。他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据盛来运介绍，10月份我国非食品类价格也开始出现上涨。

对此，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预测，年内仍有继续加息1次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次的可能。“强劲的信贷和稳定的工业增加值，使得宏观调控在治理通胀上几乎不再有任何的顾虑。在防通胀已成为未来一年中都将摆在首位任务的情况下，我们预期利率将频繁上调，从现在起到2011年年末，很可能会加息5~6次。”他说。

除了利用货币手段遏制通胀，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提示，发达国家为了拉动经济复苏，把泡沫经济输出到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泡沫经济破灭的代价却只能由新兴经济体自己承担。为了遏制输入型通胀，中国必须加快转变这种依靠大宗商品的高耗能经济发展方式。

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将“中国货币持续超发但并未出现恶性通胀”的现象称为“中国货币之谜”。在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看来，其谜底就是资产市场。股市楼市在过去20年里进入千家万户，已成为吸纳超额货币的蓄水池。如今，当一些资金从调控中的楼市外溢而出、四处寻找出口时，专家建议，应加快改革步伐，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吸引企业家回归实体经济，让实业成为充裕货币的蓄水池。

据《国际先驱导报》

国人的“幸福标准”是怎样的

“幸福指数”最近受到英、法、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特别关注。无独有偶，近日报道，中国河南的平顶山市也将辖区内的“幸福指数”作为考核干部工作成绩的新指标。让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成为“幸福的”，显然比简单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更难，也更复杂。

首先，经济发展及财富增加与幸福感之间不是等号，这一点无须证明。但搞清楚幸福感是什么，比搞清楚它不是什么还要难。西方目前编制了一些解构幸福感的指数，它们或多或少都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它们中的哪一个都不应被简单套用于中国。

中国应编制适合中国国情和大众心理的幸福指数，这是因为，中国人幸福感的构成既与西方流行的有共通之处，但差别显然也不少。我们甚至认为，把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作为一项国策十分必要，但对各国用某一个幸福指数进行排名很不科学，这样的榜单除了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它的政策价值究竟在哪里，是值得怀疑的。

中国树立建设“幸福国家”的观念是一次重要进步，为使这样的进步真正推动国家的资源分配更加合理、更准确地用于各项民生，我们对“幸福国家”的概念一定要吃透、把握。

第一，在设定这个国家目标以及将此目标具体化的全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持思想上的独立，不能被西方经常使用的概念及计算幸福的方式束缚。

第二，GDP不等于幸福感，但也切不可将幸福感与GDP对立起来。中国社会近期多少出现了一些“反GDP”的情绪，这是值得警惕的。

第三，个人的幸福感可以千差万别，但中国社会应尽可能在幸福的问题上达成大的共识。因为当“幸福”成为一个国家目标时，它就会对社会的运转施加新的外力和规则。因此公众对“幸福”的认识越接近，社会的运转将更润滑。

第四，“幸福指数”不是一个固定的系统，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在发展方向上的困惑。它在一个民族历史的纵向上，以及在不同民族的横向上，都必然是变化的。

“幸福指数”可以是很细致的单子，但从国家层面看，它又有一定的大轮廓。比如，不断发展的、给国民个人发展创造了大量机会的国家，比停滞的国家更容易创造更多的幸福感。更重视亲情、更鼓励理想、以及对信仰把握得好的国家，比在这些方面做得不足的国家更值得被称为“幸福的”。

“幸福指数”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我们应尽快赶上来了。这是因为，对幸福感的追求已经成为在中国成长最快的大众需求之一。如果我们不加快研究，我们就很容易被西方的幸福指数体系框住，即使不走错路，也很可能出大的偏差。

环文

当“受贿”与“亲和力”画上等号……

江西省新余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建华在忏悔书中说，与一些客商打得火热，错误地认为收下他们送的钱物，就是没有官架子，有亲和力；认为和他们打成一片，有利于招商引资，根本没有想到这会损害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

毫不客气地说，这一忏悔纯粹是满嘴放炮，无稽之谈。落马贪官的忏悔真是花样百出，大有“一浪更比一浪高”架势，有的责备行贿者承诺靠不住，有的责怪组织没有提醒，还有后悔自己不懂法的。贪官们的种种忏悔，都是没皮没脸地为自己的腐败辩解，以便能从宽处理。然而，贪官“雷人语录”背后暴露出的官场生态现状却令人不寒而栗，就拿

“受贿就有亲和力”来说，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到了认钱不认人的地步，对老百姓是横眉冷对，一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嘴脸，看到钱就成了闻到了臭蛋的苍蝇一般，趋之如鹜，一副奴才德性。

当受贿与亲和力画上等号，这是何等亲和力？收了开发商的钱，就表明把开发商当成了“自己人”，官与商结成了“利益同盟”，成为有福同享的“兄弟”，在送钱、收钱当中自然产生了巨大的亲和力，钱是官与商“亲和”的黏合剂。将这一逻辑拓展一下，敢收开发商钱的官员、收了开发商钱的官员，自然而然进入了官与商的“利益圈子”，都是“圈内人”，收了钱不好

好为开发商“服务”，他们恐惧的是开发商把他们送到

监狱，其亲和力定然不会少，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局面。

且看看当下我们的部分父母官的形象：豪车、豪宅、豪宅、雷言、雷语、雷行……当“权不为民所用，利不为民所谋，情不为民所系”，我们还要这样的干部做什么，在其位不谋其政，反而滥用职权，损公肥私，大肆胡作非为，除了将其绳之以法，别无他路。吴建华不是特例，也更不是最后一例，只要不端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态度，还有重蹈覆辙的后来人。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作为愿景送给为政者们，用以自鉴吧。

黄澎湃

“谁是孩子的爸爸”为何让人忧虑？

不久前，一名年轻漂亮的怀孕女子找到福建正德信司法鉴定所，要求为腹中宝宝做亲子鉴定。和她同来的还有3个男子，均是她的追求者。这名女子介绍，她在闽南地区工作，3个月前发现怀孕了。她回忆了一下，当时和这3个男子都发生过性关系，因此无法确定孩子生父是谁。她想留下孩子，为保证不嫁错人，因此把3个男子都带过来做鉴定。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准妈妈不知腹中怀着谁的骨肉，竟然带着跟她在同一时段发生过性关系的三名男子一起来作鉴定，而他们所表现出的无所谓更让人惊诧，这到底是恋爱啊、婚姻啊还是游戏啊？

按说，这是人家的私生活，只要别人愿意，旁观者是不应该说三道四的，然而，面对一个年轻女子与三个男子的高调“淡定”，还是忍不住做一回长舌妇，扮演一回OUT的角色，说点儿不着边际的闲话。

或许，这只是极端的个案，不过却把眼下一些少男少女情感迷乱的现象演绎到了极致。少数男女青年不但早早地偷食禁果，而且朝三暮四，甚至于公开宣称愿意当二奶做小三，他们根本不在乎一个情字，或许压根儿就不懂情为何物，有的只是物欲的追求、本能的享受。

再看看眼下，拿虐待动物取乐就别提了，学生遭剥衣、群殴视频时有泄露于网络，少数青年的冷血、无情，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能不能引发社会的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怪象？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的情感世界荒芜一片？是什么令他们麻木得连一点羞耻心，甚至争风吃醋的心境都没有了？

一段时期以来，青少年的性教育始终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不时就会有专家向社会发出呼吁。而在笔者看来，对青少年的情感培植，教会他们如何用情、如何爱人，让他们成为有情有义、懂得爱珍惜爱，似乎更有必要，也更迫切。

范子军



第四类情感

如今，微博中有关“第四类情感”的讨论铺天盖地。比友情多一些，但不及爱情，走在爱与不爱、性与非性之间，是一轮新时尚吗？或者，在任何年代，都有渴望悸动的灵魂，在邂逅中撩拨了彼此心灵最深处的激荡，酝酿出动人心魄的芬芳——总有一些心照不宣的默契，在暧昧中静静绽放。这种感情让人不敢前，不能后，一旦点破，出轨游戏就Game over。据调查，66.35%的人表示可以接受第四类情感，55.55%的人相信有纯粹的第四类情感存在，而64.22%的人动过寻找第四类情感的念头。

焦海洋/图

让官员主动放弃公车特权不现实

在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出了控制公车总量、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电子监控公务车、用车社会化等建议。据报道，发改委在与财政部商讨后近日对这份提案进行回应，称“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会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民革的建议”。

这条新闻的背景是，记者在为“缓堵”这个话题调查北京这个曾经的公车改革试点时，悲哀地发现：北京自2000年酝酿启动车改试点以来，已经历了近10年的长跑。可试点非但未能换来车改的大规模推行，反有止步搁浅之嫌，没有部门愿意给出车改的明确时间表。

实际上，不仅北京如此，全国的车改试点都早已陷入这种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或如辽阳那样沦为“借车”变相给领导发高补贴，或如杭州那样遇到阻力就裹足不前了。

发改委的回应，重燃公众对车改这个老大难问题的改革期待，看到了停滞的改革重新启动的希望——不过，由于未看到具体的改革措施，没有看到与以前不同的改革思路，舆论和公众对改革能否出现拐点、走出困境依然悲观。

公车改革所以陷入停滞的困境，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治理陷入僵局是一样的，也与财申报制“进一步退一步”的尴尬如出一辙，源于既得利益者的体制性阻碍。一个地方主导公车改革的决策者，本身就享受着公车福利，寄希望于他们放弃这种既得福利，非常困难。让享受着利益的人主动放弃利益，这样“自己改自己”的同伴改革，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赎买和补贴的车改逻辑，是一种妥协，可这种让步在很多时候使官员得寸进尺，拿了补贴后又不放弃公车。

公车改革十年未动，何时能动呢？车改的重新启动，须依赖于能不能突破原有的那种改革路径，有外来的力量推动着改革向前走，逼着既得利益者放弃这种滋生腐败、浪费纳税人钱财的福利。

从政协那份提案就可以看出外部力量推动的重要性。这份“建议取消厅局级以下官员专车”的提案，是由民革中央在政协上提出来的。民革无疑在公车问题上有着比较超然的利益身份，参政者和监督者的身份，使他们能够成为一种推进车改向前走的外力。

媒体还提到了另一个坚定的改革者：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作为人大代表，他连续7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疾呼公车改革；他也最身体力行——调任副厅长官员当天，他“炒”了司机，婉拒单位专车，被舆论盛赞为“全国公车成本最低的官员”。他的改革者身份，与他的身份有很大的关系，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民进中央委员。正是这种身份使其在公车改革上有着坚定的态度。

公车改革要有真正的进步，需要包括公众在内所有外部力量的推动。而这些力量能否重启停滞不前的公车改革，我们拭目以待。但愿，有关部门对政协提案的回应，充满诚意，而不仅仅是一种程序上的“客套”。京文